

# 东亚经纬

2018年第1期

## 【本期要目】

◆观察与思考·····	1
明清东亚汉文行记研究的几点设想（陈小法）·····	1
魏汉之际学问观变迁（矢羽野隆男）·····	6
日本“公司治理”经验对中国的启示（付丹丹）·····	11
阿拉伯媒体眼中的“一带一路”（归帆）·····	15
中蒙跨境物流运输便利化与企业需求匹配对策（李瑞峰）·····	19
文化认同在东北亚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娄彦春）·····	22
◆学思践悟·十九大·····	26
提升文化软实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聂友军）·····	26
十九大报告与中国新型国际关系理论（尹虎）·····	29
◆学术动态·····	34
◆征稿启事·····	38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浙江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

2018年3月31日

# 明清东亚汉文行记研究的几点设想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陈小法

自从汉字成为东亚文化圈共通的基盘和重要动因以来，中国文化在东亚地区的传播速度得以提升，受众范围极为扩展，影响深度空前拓展。而经咀嚼消化的汉文在催生促进东亚各国原生文化发轫和成型之同时，又向汉字文化圈逆向注入了明显带有诸国特色基因的新鲜血液。如此，文化的多项环流使得东亚区域文明和而不同，各具特色。而目前东亚各国传世的大量汉文行记就是中外文化环流而结出的硕果，它既是东亚文化这座大花园中的一朵“混血”仙葩，也是中国文化有机组成中不可或缺的“海外赤子”，更是从不同文化视角反观中国的绝佳文献。

历史研究需要叙述和解释的有机结合。出自各色人群之手的遣明日记<sup>①</sup>、朝天录<sup>②</sup>、燕行录<sup>③</sup>、皇华集<sup>④</sup>、使朝鲜录、东游日记、使清日记、通信使日记、漂流日记等无数汉文行记，恰为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叙述材料。而明清两代正是这类行记的高产期，这也正是我们把研究重点圈定为“明清”的关键考量所在。同时，本研究涉及的区域范围以中国、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所谓的“汉字文化圈”为主，研

---

<sup>①</sup>传世的汉文遣明使日记有策彦周良的《初渡集》和《再渡集》，笑云瑞沂的《笑云入明记》、天与清启的《戊子入明记》、了庵桂悟的《壬申入明记》等。

<sup>②</sup>明代时期，朝鲜作为“华夷秩序”中的一员，每年都要数次派遣使臣前来北京朝贡，这些使臣一般称之为朝天使。回国后，需向国王汇报明朝的情况。因此，使臣将出使明朝的见闻细无巨细地以日记形式记录下来，总其名为《朝天录》，约有45种以上。

<sup>③</sup>漆永祥在《关于“燕行录”整理与研究诸问题之我见》一文中提出“燕行录”概念界定，就是“出使中国的纪行录”，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往来中国的纪行录”。具体而言，凡到南京、北京、沈阳等地出使者所撰纪行录，皆属“燕行录”；燕行使所撰“状启”、“别单”与“闻见事件”等，皆属“燕行录”；因国境或会谈等问题至中国之纪行录，也属“燕行录”；与燕行有关但未出国境之人所撰者，不属“燕行录”；一般为宦、旅行或因他事到中国之人所撰者，不是“燕行录”；因各种原因导致误收者，更不是“燕行录”。存世“燕行录”在700-750种之间，作者约500人左右，如再加上《同文汇考补编》等所收《使臣别单》374种，则总数在1074-1124种之间。参见《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七辑，中华书局2011年，第37-66页。

<sup>④</sup>《皇华集》是朝鲜宫廷收录刊行自1450年至1633年、39位明朝使臣和300多位朝鲜文臣的唱酬作品集。除朝廷命官外，还有朝鲜僧人及七岁小童。作品文体包括诗、赋、文、词等，总计诗歌6289首，散文227篇。“皇华”之名，出于《诗经·小雅·皇皇者华》。

究主体局限于纯汉文或基本用汉文写就的域外行记。

以下就个人研究体会，对明清东亚汉文行记研究提出几点初步设想，敬请方家指正。

## 一、研究现状

就明清时期东亚汉文行记的研究，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开展。在中日两国，东游日记、来华游记和使琉球录的研究是最大热门，成果也最为丰富。而最早予以重视并进行收集整理的是日本学者实藤惠秀，“东游日记”一名也出自其手。之后中国学者也奋起直追，代表人物有钟叔河、王晓秋、武安隆、王宝平、熊达云、汪婉等，但无奈东游日记数量庞大，馆藏分散，又限于历史条件，上述研究可谓仅仅触及了冰山一角。而对于来华游记的研究，日本东洋文库的收藏为最，该文库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于1980年编辑出版了张明杰的《明治以降日本人的中国旅行记解题》，2007年中华书局进行了翻译出版。之后日本学者小岛晋治主编的《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和《大正中国见闻录集成》两套丛书为代表，网罗了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主要的作品。之于单个作品，应数“千岁丸”来华的研究最具代表，中国学者冯天瑜的《“千岁丸”上海行》就是一例。而各种研究论文数量非常庞大，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值得关注。然上述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名人、名事为主，就总体数量达到千部以上的来华游记而言，研究可谓太仓稊米，任重而道远。而对于十多部使琉球录的研究，由于近来琉球问题的凸显和钓鱼岛问题的需要，中日研究几趋井喷状态，但对琉球人撰写的各种诗学游记的研究几近空白。此外，中日两国此领域还有一群重要作品群，即遣明使日记。对于此，日本学者牧田谛亮、村井章介、牧田须子、桥本雄、鹿毛敏夫、伊藤幸司都有不俗表现，中国学者陈小法、朱莉丽、夏应元、范金明等也有专著和论文出版，但版本、文本的校订及整体的研究仍然有待铺开和深入。

中朝之间汉文行记研究，主要包括燕行录、使朝鲜录及皇华集。以韩国出版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以及林基中、夫马进编《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篇》等为契机，可以说目前正是燕行使研究起步之际。而中国学者邱瑞中《燕行录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张伯伟主编的《“燕行录”研究论集》（凤凰出版社2016）等的出版，标志我国在燕行录的研究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像《同文汇考》、《通文馆志》等仍没被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者真正收入法眼。而明清时期中国使者赴朝鲜的十几部使朝鲜录，关注者更少，虽有中国学者孙卫国作为代表，但未免有些孤掌难鸣之感。因此，涉及中朝领域的汉文行记研究亟待系统化。

中越之间的汉文行记研究，最主要的文献应是越南各朝出使中国的燕行使记录。中国以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为标志，开始受到关注。而越南学者的研究同样也刚起步。鉴于此，本领域的研究实乃朝阳事业，足有大展拳脚之空间。

涉及日朝之间的汉文行记研究，首数朝鲜通信使的日记。日本以夫马进最具代表，韩国的鲁成焕、朴现圭等学者也有较多研究。随着朝鲜通信使记录物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研究更趋热门，中国学者也加入了此行列，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出版了《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邢永凤等一些研究日朝关系的学者也有不少研究成果。但研究的定位、视角、纵深度、参与感有待商榷和补强。

而东亚海域漂流民汉文日记的研究，当今以日本学者松浦章最为杰出，研究对象涉及中日、中朝、日朝。其中崔溥《漂海录》等朝鲜汉文史料的研究，中日韩学者都有不少专著、论文发表。中国的葛家振、韩国的朴元焄、日本的今村与志雄等都有专门研究。但是，漂流民的日记繁多，水平良莠不齐，很多还是抄本、手稿，有的秘不示人，藏所分散，难以一览众相。因而，完全可期待在此分野的研究上取得突破进展。

## 二、研究意义

东亚海域之间的交流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其频率和范围达到空前规模，走出国门睁眼看世界已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各国人士的世界观也随之发生悄然变化。

首先，以中国和各国之间相互派遣的政府使节为主线，商人、民间考察团、因私游客、漂流民甚至海盗、谍报人员等人物竞相登场，使得东亚海域的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主层次交流网络错综复杂。同时，日本、朝鲜、琉球王国、越南等国之间也暗流涌动，交往日益密切。这些看似排除中国在外的交流，实际上中国在大多时候扮演了“不在场的在场者”，交流者们自觉而不自觉地把“现实中国”和经由文献记载和描述而转化而来的“记忆中国”，当做衡量和评判自他国文化的标尺。因此，这些材料与我们中国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中国文献的一个特殊部分，值得也应该去研究。

其次，当前之所以要对上述材料的具体内容、体裁特色、思想文化、传播及影响开展纵横研究和探讨，是因为它们乃中国史、世界史、汉语言文学、外国文学、文献学甚至社会学等学科非常值得期待的领域之一，通过它们极易斩获研究所需的新史料、新语料。

第三，东亚汉文行记在补缺正史不足、方志漏记、丰富汉语词汇、表现力等方面

不可小觑。尤其是作为明清中国国内问题的研究，上述史料提供了明清易代的历史细节、各大城市的社会生活、传统风俗与地方演剧、清代满汉之间的冲突等中国文献中所没有的或被本国人士所忽略的重要记录。

第四，通过对东亚汉文行记的研究，我们可以跳出中国而又反观中国，从而以异域之眼了解中国历史社会的真正特性。

第五，本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是有关东亚关系史研究的根本之一。

第六，利用好这些材料，是挖掘深化、继承弘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源泉和途径之一。

### 三、研究内容

东亚汉文行记不仅是一个文学文本，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文本。国人的境外行记大多有笔叙异域、意在中國之旨趣，当跟随作者的笔触行走，不仅可以领略异域风情，同时也可体会行记人的心象世界。而出自外国人之手的汉文行记，我们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更好地观照汉字文化和中国文化，进一步理解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得以维持和平衡的基础何在？东亚区域文化得以继承和繁荣的动因何在？鉴于此，明清东亚汉文行记研究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如下几方面：

**使节行记：**主要包括明清使节出行日朝越琉等国的行记，如使琉球录、东游日记、使朝鲜录等；日本使节来华的遣明日记、使清日记；朝鲜使节来华的燕行录、访日的通信使日记；越南使节来华的燕行录；琉球使节来华的游记等。

**个人游记：**主要包括清代国人的东瀛游记、日本幕末明治初期来华的个人考察记等。

**漂流日记：**主要包括明清时期东亚海域各国之间得到救助的漂流民所留日记。

**其他：**主要包括一些轻游程游观而重游感抒怀的作品，如诗人游记、哲人游记等。

对于以上四大类行记，在对版本、文本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作者背景、时代特色，深入研究写作目的、蕴含思想、文献功能等，并以专题研究的方式挖掘每本行记的价值和亮点所在。

### 四、研究框架

汉文行记是个庞然大物，必须抽丝剥茧和大处着眼双管齐下，方能一叶知秋，不失

全面。总体框架可以如下：

总论：把明清时期所有的汉文行记纳入总视野进行整体研究，分析此一时期汉文行记所呈现的哲学、文化、道德、科学、政治、宗教、民俗等方面的意涵，剖析这一文体作者群的独特性和辨识度。

分论：以国别和形态为分类标准，把所有行记放入上述两个坐标进行研究。一是分析各国汉文行记的整体概况、题材类型、文体类别、著述特征；二是研究同一形态的行记各国所呈现的风格特点、异同之处。

个案：对各国重要的汉文行记逐部进行研究，内容包括解题、研究、校注、影印。

## 五、研究目标

在东亚汉文行记中，除传统的怡情山水、借景抒怀外，大多的记载是“自然相”与“社会相”的浑然结合，而两者的比重也决定了作品的好坏。因此，研究目标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以这些史料为基础，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研究明确明清东亚汉文学的交流情况，厘清中国汉字文化在东亚各国接纳及演变的过程，从而为当今中国文化的再次走上东亚甚至走向世界提供经验教训。

第二，从相同的角度来观察同一种类的行记，根据其所记内容的不同，可以立体多面分析临近近代的东亚国际秩序、社会习俗、历史文化等现实状况，同时可明确中国、日本、韩国三国当时各自所处的位置，并通过各个行记作者的现实观感与他们拥有的历史记忆之间所产生的冲击，来了解在面临时代大变革之际，东亚各国决定历史命运的动因以及区域板块整体走势的关键所在。

第三，通过本选题的研究，可进一步激活中国文化的海外因子，丰富中国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为进一步做好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盛世修典工作打下基础，为更好传承文明添砖加瓦。

# 魏汉之际学问观变迁

-以东汉的王符为中心-

日本四天寺大学人文社会学部 矢羽野隆男<sup>①</sup>

## 前 言

学问是和事物看法，思考方式不可分的精神活动。主张“绝学无忧”“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而否定学问的道家是一个例外。但是，对儒家来说，学问是思想的基础。因此，一个思想家如何来看学问，换句话说，“学问观”是表示那位思想家之特征的一个指标。实际上，孔子、孟子、荀子、朱熹、王阳明等人的思想和他本身所拥有的学问观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只想起这几个例子，就能了解一位思想家的学问和他的思想的密切关系。

本文的主旨是从东汉思想家王符的学问观中指出王符的思想特征。然后再从王符的思想特征中找出西汉末期的扬雄和东汉末期的徐干的学问观的相似点。我认为他们的学问观之特征即象征着魏汉之间的思想变迁。

本文首先阐明王符的学问观，再就其结果来指出魏汉时期出现和王符的主张相近之思想家扬雄徐干的思想，最后就其事实思想史上的意义突出个人看法。

## 一、到目前为止关于潜夫论赞学篇的研究

王符的学问观几乎集中在《潜夫论》开头的《赞学篇》中。但有关《潜夫论》的研究不能算多。大陆与台湾关于王符的研究有王步贵的《王符思想研究》、黄盛雄的《王符思想研究》和徐平章的《王符潜夫论思想探微》。这些论文著作虽也研究《赞学篇》中的学问观（日本几乎没有关于赞学篇的研究论著），但主要是着重《赞学篇》和《荀子》的学问观相似的地方而评论它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其中特别受到注目的相似点是“假（凭借的意思）的思想”和“重视教师”的两个论点。

例如徐平章先生所著述关于“假（凭借的意思）的思想”有如下的论述：

为学得有所假，所假者厚，则其智愈明，赞学篇第一曰“是故造父疾区百步而废，自托乘

---

<sup>①</sup>通讯作者：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范晓阳

与，坐致千里。水师泛轴，解维则溺，自托舟楫，坐济江河。是故君子者，性非绝世，善自托于物也。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明智有相万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也。君子之性，未然尽照，及学也，聪明无蔽，必智无滞，前纪帝王，顾定百世。此则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以自彰尔。”此则荀卿假学之余意。

又关于“重视教师”也有如下的论。

惟力学亦须就师，诚以古之上圣，由待从师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况凡夫俗士乎？赞学篇第一曰：“虽有至圣，不生而智，虽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皇帝师风后，颛顼师老彭，帝喾师祝融，师务成，舜师纪后，禹师墨如，汤师伊尹，文武师姜尚，周公师庶秀，孔子师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则人不可以就师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圣也，犹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况于凡人夫乎？”（中略）此学既须假于外，所得者必外于吾心之义也，其为荀卿制齐教，复河拟乎。

如徐平章先生所说，《赞学篇》的学问观受了《荀子》的影响很大，这是事实。本来在儒家中特别强调学问的重要性的是荀子。《荀子》一书的开头即《劝学篇》，而《潜夫论》的开头就是《赞学篇》，从这点即可看出《潜夫论》受《荀子》的影响很大。但是，在详细地研究看看，王符除了和荀子有相似的地方之外，不同的地方也不少。因此，考察了他们的差异点，则可以显明地看出王符的学问观在思想史上的特征。

## 二、《荀子·劝学篇》和《潜夫论·赞学篇》的差异

荀子强调学问的必要性，是因为“礼（规范）”是荀子思想的根本而学问以确立“礼”为最后目的。《四全库简明目录》简洁扼要《荀子》一书的要旨说：“其书旨在劝学，其学主修礼。”荀子的思想是学问的最后目的在修礼。

其数（学问的教程）则始乎诵经终，终乎赞礼（《荀子·劝学篇》），

学问的教程始于诵经，最后在修得礼。而且，学习这个教程的过程中，师事老师比《诗经》《书经》《春秋》等经典还重要。

学莫便乎近其人（表示教师），礼乐法而不可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仿其人而习君子之说，则尊以偏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径，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此之（同上）

荀卿主张亲近老师比经典甚至礼还要来得重要，为什么呢？在荀子当时的时代中，文献整理或注释研究尚未十分发达，所以讲解经书而正确示范“礼”的老师是极必要的。为了实践“礼”教师给学生示范活生生的榜样是必不可缺少的。

荀子以后的学问观，比如《吕氏春秋·孟夏纪》的诸篇（《尊师篇》等），《淮南子·



修务训》，贾谊《新书·劝学篇》等也都重视向老师就学这一点，特别是西汉儒家贾谊受荀子影响，想透过教师、学校、礼等规范制度来达到儒家的中央集权礼制的建设目标。西汉时期，建设太学，在经典解释上尊重师法，这可以说是受到了荀子学问观的影响而成。

《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新书》等西汉初期的学问观是注重礼、教师等外在的规范，相对地，东汉的王符之学问观则注重在经典。王符确实继承荀子“假（凭借）的思想”，但是凭借的对象和荀子不相同。他们最大的差异在，荀子单单只说了必须凭借学问，但王符则主张应该凭借经典。

学问圣典，心思道术，则皆来睹矣。此则道之材也，而人之假之，则为已知矣。（《潜夫篇·赞学篇》）

“人假之”的“之”很明显的是指“圣典”，严密地说，即是“圣典”中蕴含著的“道”。而且王符认为学习圣典中蕴含的“圣人之心”是最重要的，教师则不是那么重要。因此，《赞学篇》中言及教师的部分不多也是可以证明的。如上所述，荀子认为：应该重视的王符学问观之特点是学习经典的态度和学习后所达到的精神境地。王符认为把全副精神集中在经典上（这是学习态度），这样才可以和“圣人之心”合为一体（这是所达到的精神境地）。

先圣之智，心达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经典以遗后人。试使贤人君子，释于学问抱质而行，必弗具也。及使从师就学，按经而行，聪达之明，德义之理，亦庶矣。是故圣人以其心来造经典，后人以经典往合圣心也。故修经之贤，德近于圣矣（同上）。

通过学习经典而达到与圣心合为一体的境界。这样的王符的学问观和荀子的遵从教师和礼教的规范大异其趣。他主张的是非常接近圣人的“聪达之明，德义之理”，由自己的内心去求得圣人的智和德，把这样自己内心获得的像圣人的理性叫作“主体理性”。

### 三、与王符相近的学问观——徐干、扬雄——

在西汉末期的扬雄已经主张了像王符一样以经典为媒介从中求得圣心的学问观。在扬雄的时代里盛行被称为“章句”的繁琐之解经形式。当时，学者们忽视经典里最重要的内容“大义”，引用许多资料以求学说精密化，反而逐渐丧失作学问的本质。在这情况下，扬雄潜心治学一心冀达圣心。他的学问观在《法言》开头的《学行篇》和《吾子篇》中约略可见。扬雄非常尊崇经典。

舍舟航而济乎读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同上）

何故？即使现在圣人不在，从经典中依然可以得知圣心。

或曰“恶睹乎而折诸”？（意思是：有人问扬雄说“按照什么知道圣人的真意？”）曰“在则人，亡则书。”（同上）

他认为：依着经典来学习而强烈冀求与圣人合为一体的境界，就可以达到这境界。以下的引用可以证明。

希冀之马，亦驥之乘也（意思是：希望驥马的马也是驥马的同类）。希颜（颜渊）之人，亦颜之徒也。或曰“颜徒易乎？”曰“希之则是（如果希望达到颜渊，就可以达到他）”曰“昔颜尝希夫子矣。不欲希，则已矣。如欲希，孰欲焉。”（学行篇）

仲尼潜心于文王矣，达之。颜渊亦潜心于仲尼矣，未达一问耳。（《法言·问神篇》）

由此，可以看出扬雄也在探究着自心与圣心（体现真理的人格）之一体化。东汉末期的徐干也是潜心追求圣人之道学者。而且在他所著《中论》的开头也有一篇阐述学问观的《治学篇》，那是继承《荀子·劝学篇》以来的传统。但是，徐干的学问观亦和荀子有差异，具有与扬雄、王符相类似的特征。

徐干也认为经典是圣人把真理记载下来流传给后人的，所以极为重视。

圣人亦相因而学也。孔子因文武，文武因于成汤，成汤因于夏后，夏后因于尧舜。故六籍者，群圣相因之书也。其人虽亡，其道犹存。（《中论·治学篇》）

他说，圣人世代相传的真理存在经典之中，学者透过经典必需和“昭明（像圣人那样的理性）”合为一体。

今日之学者，勤心以取之（“之”表示存在经典的道），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达矣。（同上）

以经典为媒介来学习，终于达到“昭明”。徐干将如此学习之成果，用“心”这样的词汇表示如下。

圣人之道，非取乎一道。故曰，学者所以总群道也。群道统乎己心。唯所用之。（中略）述千载之上，若共一时。论殊俗之类，若与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见其情。原治乱之渐，若指己劬。（同上）

上面引用说：自己的心中存有真理的话，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能毫无迷惑地处理问题。他还说：

（大贤和凡人有差别，是因为）心乎群而不缪，智周乎万物而不过，变故暴至而不惑，真伪丛萃而不迷。（《中论·审大臣篇》）

这也阐述着统一众多真理的是心。扬雄说“潜心于圣人”，王符说“结心于夫子之遗训”“以经典往合圣心”，按照他们的发言可以看出他们俩追求与圣人合为一体的“主体的理性”的特征。徐干说“群道统乎己心”“心统乎群理”，可以发现到比扬雄王符更倾向追求圣人那样的真理。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心之诸说）指出徐干的“心中

含理之思想，实可谓开宋儒‘理具于心’之说之先河也。”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可以说扬雄王符的学问观的追求“主体的理性”的倾向，到徐干时，更为重视理性，令人想起宋学。

## 结 语

西汉后期的学问逐渐地丧失本质之剩形式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扬雄王符徐干等人重视“主体的理性”的学问观。如前所述，扬雄的时代专讲“章句之学”，东汉时代更出现“浮华”之风潮。学者们不专心治学，一心结交权贵利用关系想办法受高官推荐。于此“章句”的弊害，“浮华”的风气，学问逐渐变得有名无实在，于是产生了王符等人批评时弊，重视主体理性的学问观。

此学问观的出现象征着从汉到魏之一种新思想的展开。概观整个中国思想史全貌，可以说：批判有名无实形式化的学问风潮，转而追求真理的主体理性，这个学问的态度是思想史推展的原动力。比如，《五经正义》出现后，汉唐注疏学的治学方向变得不见学问之本质而舍本逐末、渐趋琐碎，于是韩愈力倡“先王之道”以彰显儒家学问原来所持的政治意义和道德意义。重视心和理的宋学及源于韩愈。此外，朱子学官学化以后，甚至到了明代拥有它固定的权威，陈献章感到自己的心和真理相乖离而提出“吾此心与此理，未有所湊泊吻合”，表明了对朱子学的不满。陈献章被认为是明学的先宗。“主观理性”克服着已经形式化的教义，这如果是产生中国思想史的一个形式的话，或许可以说明扬雄之后所重视的“主观理性”之学问观是表现出汉魏之间的思想史之开展。

# 日本“公司治理”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以日本“公司法”的修订为中心-

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付丹丹

日本公司法从 2002 年开始确立了公司治理的选择制。之后，对它的实践效果进行持续跟踪。分别在 2006 年和 2015 年颁布实施了修订版，对选择制公司治理结构不断补充和完善。目前日本公司法共列出了 50 种治理结构供公司自由选择。日本公司法修订既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也是为了顺应世界公司治理的美国化趋势。但最重要的目的还是为了通过增强企业的监督职能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可以说，日本公司法中的选择制公司治理结构对我国立法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的构建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一、日本对《公司法》的修订措施

日本立法从 2002 年开始确立了公司治理的选择制。而 2006 年版《公司法》进一步完善了这种选择制，将原来商法典中关于公司的规定以及相关的公司特别法、有限公司法合并形成了单行法。将传统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股份公司的一种基本形态，取消了最低资本的限制，对日本传统公司法进行了颠覆性变革。由于传统的有限公司成为股份公司的一种基本形态，股份公司从只有一个小股东的小型个人企业到大规模的上市公司，公司之间不论是规模、业务类型、股份的流通性，还是公司经营的形式，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对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要求也就多种多样，日本公司法为了适应不同类型公司的要求，准备了 39 种公司治理类型供企业选择。公司法原则上仅要求公司设置股东和董事，其他的机关基本上可以通过章程自由选择<sup>①</sup>。

即使这样，2006 年版《公司法》中提供的大型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只有 2 种，

---

<sup>①</sup>《公司法》并非完全允许公司自由选择机构设计。也设置了一些限制：1、公众公司股份转让频繁，不能指望股东去监督公司的业务执行，因此规定了董事会监督业务执行的义务。2、设置监事会的公司如果只有一名董事，而监事有 3 名，业务监督者多于业务执行者，有失平衡，因此要求设置监事会的公司必须设置董事会。设置董事会的公司原则上必须设置监事（董事会下设委员会公司必须设置监查委员会，因此不需要监事。不过非公众公司中设置董事会的公司，如果设置了会计参与，就不用设置监事。没有设置会计参与的非公众公司可以把监事的审计范围限制在公司会计审计。）3、设置会计审计人的公司需要设置监事或在董事会下设置委员会。会计审计人发现问题必须报告监事（监事会）或监查委员会。大公司则必须设置会计审计人，也必须设置监事会或监查委员会。2002 年《商法》修订时，引进了董事会下设委员会制度，之后监事就不再是日本企业的必设治理机构了。

即设置监事会的公司和设置委员会的公司。这两种治理结构在运作中暴露出很多问题。首先，在设置监事会的公司中，监事会由 3 人以上构成，其中的超半数独立监事，需要 1 名以上常勤人员。监事拥有独任权，但是基本上只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监查，不监督董事等的行为是否适当，对董事等执行业务只能进行事后监查，不能进行过程监督，虽然有出席董事会议以及陈述意见的权利，但是没有表决权，所以其监督力度受到国外投资者的质疑。

另外一种治理结构——设置委员会的公司，不设监事，但要求董事会下设监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由 3 名以上董事构成，其中超过半数必须是独立董事。而日本独立董事人才储备不足，结构不合理，且由于该类型的治理结构把公司的人事权和薪酬权交给了以外部董事为中心的委员会裁决，很多传统的日本公司不愿采用，自实施以来，采用该模式的公司为数不多，截止至 2017 年 8 月 1 日，东证 1 部 2020 家上市公司中共 62 家公司采用，占总数的 3%。

因此，为了强化日本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弥补设置监事会公司的结构弱点，解决独立董事不足等现实问题，2015 年版《公司法》推出了新的公司治理结构，即设置监查等委员会的公司，此类公司的治理结构为董事会+监查等委员会+会计审计人，其结构严格等级基本等同于前两种治理结构。至此，日本大型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模式有 3 种，即“设置监事会的公司”、“设置监查等委员会的公司”和“设置提名委员会等的公司（即设置委员会公司）”。而《公司法》提供的股份公司的机构设置选项增加到 50 种。

## 二、对我国立法的启示——基于现实，追求理想

日本公司法中的大型三种上市公司可选择的监督模式，其目标是一致的，即通过一个专门的监督机构来监督管理执行人员的行为及公司财务状况，只不过是监督机构的位置及组成不同，是内于公司的董事会还是外于公司的董事会，这牵涉到公司治理的理念及理论的不同，更牵涉到人员配置的不同。2015 年日本公司法修订创设了第三种监督模式——监查等委员会。之所以增设第三种监督模式，是为了促进独立董事制度的采用，顺应国际公司治理趋势。但是立法者也考虑到日本的现实问题，那就是①独立董事人员储备不足，②因为公司的人事权和薪酬权基本上都交给了外部董事，所以传统日本企业不愿意采用设置委员会的监督模式。所以，第三种治理模式的出现是基于现实，追求理想。

而中国现阶段，独立董事等一些资本市场制度的建设具有较强的政策驱动性质。

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资本市场的现状和需求，导致某些制度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总之，《公司法》等法律实践性强，只有从实践出发，注重实施效果，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 三、对公司治理结构设计的启示

一直以来，日本的公司治理模式被总结为二元平行治理模式。即将美国公司的“董事会主义”一元模式和德国公司的“监事会主义”一元模式，改造为董事会负责战略决策，监事会负责监督董事会的平行“二元”治理模式。21世纪以来日本也逐渐向英美式模式转变，在2002年导入了独立董事制度。中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和日本最相似。中日两国都是在董事会和监事会并存的前提下引入了独立董事制度。

在中国目前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大多监事会形同虚设，独立董事被讽刺为“花瓶”，大多数公司治理结构由单一权利主体主导，事实上形成了“股东+董事会+管理层”或者“董事会+管理层”的垂直“一元”治理模式。

#### （一）选择制公司治理结构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公司法》中共提供了50种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改革后的公司治理结构没有所谓的一层结构、二层纵向结构或二层平行结构。超越了“股东会中心主义”或“董事中心主义”或“监事会中心主义”的范畴。各种选项没有孰优孰劣，而是与公司的规模、股东的人数以及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的程度息息相关。比如，全部股份限制转让的封闭性公司，股东构成稳定，股东可以起到监督作用，只需要会计专业人士检查会计帐簿的真实性，因此这类公司可以选择只设置会计参与，无需设置监事，股东会可以成为万能的机关。这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而大型上市公司股东众多，很多股东只关心公司股价的涨跌，并不关心公司的经营状况，不可能期待股东有效行使监督权，且公司能够承担设置复杂治理结构的费用，所以此类公司可以选择传统的董事会+监事会结构，或者董事会下设提名委员会等的结构，或者董事会下设监查等委员会的结构，且上述三种结构同时必须设置会计审计人。

日本这种打乱传统，允许公司根据自身情况在众多基本模式中进行选择的方式，减少了企业遵守的成本、激发企业自主性，可以为我国改革提供借鉴。当然，中国若引入选择制公司治理模式，应该事前认真调研，设计出真正符合实际需求的治理模式，而且也应该考虑到多种模式并存可能会带来的一段时间的市场混乱等问题，并提前做好对策。

另一方面，如上所述，日本公司治理结构还存在多种选择项之间逻辑不统一、监督

力度不能保证等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借鉴过程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比如，日本《公司法》规定设置监查等委员会的公司可以不设常务监事，也没有赋予监事独立监查权，这不利于监事对公司业务的掌握和监督力度的有效发挥。

## （二）对独立董事制度的启示

中日两国都是在董事会和监事会并存的情况下导入了独立董事制度。中国现在，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等结构职能分工不清、界限模糊，容易造成重叠和资源浪费。日本《公司法》中明确指出，设置提名委员会等的公司和设置监查等委员会的公司，不能再设监事（公司法 327 条 4 项）。这就避免了类似职能机构的重复设定，避免了资源浪费。中国可以借鉴此法，根据不同公司治理类型区别要求，理清各种职能机构的分工。

总之，日本公司法中规定的公司治理结构对我国立法以及公司治理体制的构建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公司法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法律，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也会滞后。2015 年版《公司法》实施后，已经过去了 3 年。鉴于公司法中部分条款之间存在逻辑不一致等理论问题，以及在实践中遇到的现实问题，2017 年 2 月，日本法务大臣召开审议会，开始讨论公司法修订，并计划在 2018 年 2 月或 3 月颁布《中间试案》，2019 年正式实施。可见，日本立法者不断对《公司法》的实践效果进行跟踪调研，并定期修订，以保证《公司法》的实践价值。

# 阿拉伯媒体眼中的“一带一路”

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归帆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这一倡议提出至今，已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在中国对外交往的版图中，阿拉伯国家始终占据重要位置，且自古以来正是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国进行友好往来，因此在“一带一路”的宏伟构想中，占据地缘优势的阿拉伯国家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

阿拉伯智库、学者和媒体也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浓厚兴趣。经过中国国家领导人、中国政府部门和外交机构在国内外的多次阐释和呼吁，随着中国与相关国家在具体项目上的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吸引阿拉伯世界越来越多的目光。

## 一、阿拉伯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正面报道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阿拉伯商界、政界、文化界对这一倡议持续关注，各国媒体相关报道日益增多。根据检索出的新闻报道进行研读和初步分析，大多数阿拉伯媒体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是事实性或消息性报道，基调也相对客观。很多阿拉伯专家学者也在媒体撰文、发表文章、接受采访、表达关切。这些评论中，不乏有建设意义的独到分析。阿拉伯媒体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分析“一带一路”发挥的积极作用。

### （一）有利于沿线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

金融危机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而中国经济则保持了平稳快速发展。因此，多数阿拉伯媒体都聚焦“一带一路”伟大构想的提出背景和实施路径，并着重解读中阿共建“一带一路”，构建“1+2+3”合作格局对中阿经贸关系的影响。

阿拉伯各国媒体还强调各自国家具备的独特优势，希望能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阿拉伯媒体还报道了多个阿拉伯国家筹划的与“一带一路”对接的本国项目。如科威特拟斥资1300亿美元，在其北部海岸建立“丝绸之城”，并在科威特与伊朗边境地区建立一个250平方公里的自贸区，通过大桥与“丝绸之城”连通。阿曼制订了



两个计划，一是在东北部海滨建立杜库姆经济特区，其中涵盖八大经济与文化功能。二是在南部的萨拉拉港打造郑和纪念园区，郑和下西洋时曾三次到达这里。阿曼政府规划在这里建设一个郑和纪念园区纪念郑和，同时也可以吸引来自中国及世界各地的游客。卡塔尔要建一个“多哈新港区”。在现有多哈港的基础上进行扩建，这也是一个大型园区的建设项目。卡塔尔方面同时也介绍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的“铁路相连计划”。多哈新港的建设规划方面，除了港口扩建之外，铁路连通方面也是一个重要考虑。卡塔尔方面也希望中国企业能够积极参与。

## （二）彰显中国外交政策转型

不少阿拉伯媒体和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背后是中国政府的国际政治考量：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积累了巨大财富和资金，而且在基础设施、信息产业等诸多领域具备了较为先进的技术能力。在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后，中国需要在国际舞台发声，甚至主导国际规则的制订。丝路计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有的阿拉伯媒体认为，“一带一路”构成了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战略新格局和周边外交战略新框架，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发生实质性变化。有的阿拉伯媒体认为，“一带一路”所蕴含的“和平”“友好”“合作”等精神有助于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跨越地理、种族、宗教、文化的差异，以更加包容和理解的心态进行政治交往，用对话的方式解决政治分歧。

## （三）进一步促进与沿线阿拉伯国家的人文交流

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化意义一直被国际学界津津乐道。阿拉伯媒体通过对比古代丝绸之路和新丝绸之路，表达对新丝路倡议的憧憬和希冀，认为丝路精神意味着文化之间的互鉴，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应采取更加开放的立场，通过相互联系增加文明的多样性。

## 二、阿拉伯媒体对“一带一路”的误读和误判

受历史文化差异、现实利益冲突、外部环境干扰等因素影响，阿拉伯媒体在看待“一带一路”时，也出现很多疑虑和担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 （一）地缘政治挑战

很多阿拉伯学者认识到地缘政治是“一带一路”面临的极大挑战。如埃及学者指出，“尽管人们充满热情和乐观，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带一路’的实施是轻而易举的。

挑战依然巨大，譬如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大国之间的竞争及其对地区的影响，而改变地区局势可能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在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涉及中美政治、经济关系走向的问题，如中美之间能否形成和谐且有利于中东地区稳定发展的关系，“一带一路”会不会成为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对抗争利的博弈场，也是阿拉伯媒体普遍关注的问题。

## （二）恐怖主义威胁

阿拉伯媒体还指出“一带一路”面临的巨大挑战来自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报道提及亚洲不断蔓延的恐怖主义威胁、“伊斯兰国”在中国周边地区活动及恐怖主义网络动员等问题，强调了跨境恐怖主义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 （三）合作不对等

有的媒体委婉指出中国和非洲进行能源和基础设施合作时出现的问题，认为中国没有充分考虑并照顾对象国的需求，希望能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时引以为鉴。

# 三、改进“一带一路”倡议在阿拉伯世界传播的建议

总体上看，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机遇空前，但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虽然该倡议已在国际社会引起良好反响，大多数阿拉伯媒体的报道客观公正，阿拉伯国家普遍持认可的态度。但还有一些媒体由于缺乏了解，仍然质疑这一倡议。如半岛电视台的报道质疑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真实意图，称其展示了我国的雄心及挑战美国霸权的决心，“一带一路”被视为我国的经济霸权战略。鉴于此，我们要继续有针对性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凝聚起更多的共识和信心。

## （一）加强宣传力度

我们要从战略高度看待“一带一路”对外宣传工作，视其为中国媒体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契机。我国媒体应主动设置“一带一路”议程，传播好这一倡议，扩大我们在国际舆论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阿拉伯媒体在涉及“一带一路”主题时，频繁引用中国官方权威媒体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的报道和外交机构的有关表述。这些做法提高了报道的客观性和准确性。阿拉伯媒体不再照搬西方媒体言论。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在阿拉伯国家的宣传是有效的。中国媒体应继续加强宣传力度，阐明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

理念，强调开放、平等、包容，突出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思想。

## （二）精准传播

阿拉伯各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情况不同，各国国情存在巨大差别，不同国家对于“一带一路”有着不同的期许。我们应该了解阿拉伯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点和疑虑所在，并做出有效的、令人信服地回应。

## （三）尊重传播规律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应摆脱“唯政治论”的消极影响，充分重视传播的效果，声音不仅到达对方，更要被对方心悦诚服地接受，才是成功的传播。

## （四）动员多种力量

**官方：**发挥主流媒体作用，如新华社阿拉伯语专线、人民网阿拉伯语专线、中央电视台阿拉伯语频道等，在宣传“一带一路”倡议方面已取得良好成效，其使用的很多表述已被阿拉伯媒体广泛使用，一些文章和节目还被阿拉伯媒体转载或转播。

充分发挥驻外使领馆作用，利用在外人员熟悉国情的优势做好传播。中国驻阿拉伯使领馆已经积极参与到传播“一带一路”倡议的工作中，如大使在媒体撰文、接受媒体采访、参加学术会议、邀请当地专家学者来华等形式，已取得广泛关注。

我们还应加强与阿拉伯国家政治家、专家学者、媒体人等人群的对话和交流，争取他们的支持和理解。

**民间：**中国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中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深谙外国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人才，由他们一起参与对外传播工作，在国际主流媒体发出中国声音，以弥补官方媒体的不足。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4年多来，国内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给予广泛关注，全面分析、客观了解阿拉伯世界有关“一带一路”的报道，具体梳理报道中的观察视角和代表性观点，有助于我们增强“一带一路”建设的信心，纠正建设中可能出现的偏差。针对阿拉伯媒体报道中的疑虑做好针对性回应，从而增进外界对它的认识 and 了解，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更好的舆论环境。

# 中蒙跨境物流运输便利化与企业需求匹配对策

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李瑞峰

随着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与推进，中国与蒙古之间的货物运输在数量与内容上出现了新的变化。从事中蒙物流运输的企业对中蒙跨境物流运输便利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中蒙跨境物流运输便利化存在一些现实障碍需要认识和改善。

## 一、中蒙提升互信程度，这是实现中蒙跨境物流运输便利化的前提

（一）中国的发展有利于周边国家的发展。中蒙地理相邻，经济互补，中国的市场、资金、技术、通道和蒙古的资源优势互补性很强，有许多合作机遇。中国的持续发展，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能够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合作伙伴带来巨大市场合作和发展机遇，促进周边国家以及东北亚区域的发展和稳定。

（二）中蒙增加互信有利于中蒙经贸的发展。尽管近年随着中蒙国家层面的共同推动，经贸合作迅速展开，社会人员交流增加，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中蒙人民之间真正的了解和学习仍然不充分。根据蒙古最具影响力的社会调查公司圣马拉尔基金2016年的调查数据，在蒙古最有好国家排名中，中国仅排在第五位。中蒙之间存在缺乏相互了解和信任的问题。

（三）中蒙关系是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的最好关系之一。当前中蒙高层、政府各部门互访频繁，我们需要珍惜当前良好的局面，从而进一步加强双方互信和推进各领域实务合作。

## 二、中蒙的经济结构互补，这是中蒙跨境物流运输便利化的现实需要

（一）蒙古的产业定位问题。蒙古国内的主要经济部门是采矿业和农牧业，大概占国民收入的60%。当前，蒙古国开始调整经济结构，主张在发展矿业的同时，强化加工制造业的发展。从长远来看，这是发展服务贸易的基础。但是我们也看到蒙古产业政策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尤其在吸引外资方面，蒙古国政府需要做出努力。

（二）中国的产业转移问题。中国的发展已进入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处于全面调整和升级的阶段，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过去，中国产业发展主要是解决短缺问

题。近期，中国产业的突出问题是钢铁、煤炭等部分重化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相对应地，中国经济中的主导产业也从原先的重化工业向创新密集型部门转移。

（三）中蒙产业结构存在天然的互补性。蒙古国 80% 的以上的产品出口至中国，大概有 30% 的产品从中国进口。中蒙贸易、投资方面，中国已连续 10 多年成为蒙古国最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外资来源国。2015 年，中国企业累计对蒙古国和俄罗斯投资分别是 40 亿美元、330 亿美元。2017 年上半年，中蒙贸易额实现 31 亿美元、中俄贸易额近 400 亿美元。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中蒙企业可以不断拓宽和深化合作领域，促进贸易结构优化。

### 三、中蒙跨境物流运输发展面临三个瓶颈

（一）交通瓶颈。随着蒙古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对公路、铁路的使用需求也相应增加。同时蒙古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活动及区域合作的频繁发生，也对蒙古国的交通运输提出了更高要求。蒙古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面临三个挑战：需求大、规模大和资金缺口大。

蒙古国没有出海口，交通运输分为铁路、公路、航空，其中以铁路和公路运输为主。但由于多年投入不足，蒙古国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且进展缓慢，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2010 年初蒙古国大呼拉尔通过 22 号决议，制定了国家铁路网拓展远景规划，计划修建以下铁路：戈壁地区铁路线；东部区铁路线；西部区铁路线；铁路网横线；规划线路总长 5683 公里，但 7 年来铁路建设工程进展缓慢。

《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确定的 32 个合作项目，三分之一涉及道路通道等基础设施领域。目前，中国通过多方面考察，提出 2 条新增中蒙俄互通铁路方案：锦州—赤峰—珠恩嘎达布其—乔巴山—赤塔；珲春—长春—阿尔山—乔巴山—赤塔。但由于战略考虑、经济利益上的分歧以及蒙古在资金上的困难，目前中蒙跨境铁路建设进展缓慢。

（二）投资瓶颈。近几年，蒙古国经济环境的恶化及其国内政策频繁变动严重影响了外商对蒙古国的投资信心，特别是在外资法方面的不可持续性对蒙古国吸引外资产生了不利的影 响。新投资法对外国投资包括中国、韩国、日本都产生了负面影响。虽然 2013 年 9 月，蒙古国大呼拉尔又通过了新的《投资法》，但是很多政策并未得到实质性的落实，也使很多投资者处于观望状态。受此影响，蒙古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了剧烈的波动，由 2011 年的 49 亿美元下降到 2016 年 13 亿美元，直接原因就是投资主体减少造成的。

（三）中蒙自由贸易区建设瓶颈。建设保税区或者进一步建设自由贸易区，对于便利贸易和降低关税有着重要的作用。蒙古国政府重视自由贸易区建设，建设自由区的目的是为了替代进口商品、增加出口产品、引进新技术。国家大呼拉尔也于 2015 年 2 月 12 日制定了统一的经济自由区法。目前，蒙古国拥有阿拉腾布拉格、扎门乌德、查干淖尔等三个自由贸易区，至今共投资 350 亿蒙图，其中只有阿拉腾布拉格自由贸易区投入使用，我们看到对俄罗斯联邦的自由贸易区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对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推进缓慢。在扎门乌德自由贸易区蒙古坚持引进战略投资，虽然筛选过战略投资，但是至今未能取得显著成果。目前有 13 家企业在该自由区占有土地，取得在该自由区的经营许可。

互联互通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领域，实现中蒙跨境物流运输便利化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规划纲要》中所确定的项目落实，需要中蒙双方增加共识和务实态度以推进合作，实现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促进资源高效配置。在中蒙俄经济走廊早期建设中，可以充分发挥企业的作用，因为企业的活力是经贸活动的关键动力，鼓励有实力的企业积极参与到经济走廊的建设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企业集聚可以形成比较优势，促进特色产业的形成、发展以及国际市场的现实需求，最后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

# 文化认同在东北亚区域发展中的作用

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姜彦春

冷战结束后，文化因素成为影响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在全球化及区域一体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东北亚地区在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方面得到了较快发展，这一地区的发展和稳定引起了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此同时，东北亚文化认同也日益引起区域内各个国家和人民的关注和重视，文化认同成了除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之外观察、理解和研究东北亚区域合作和发展的又一不可或缺的因素。

文化认同作为一种软实力，有着潜移默化的巨大的影响力和作用力。它不仅可以有效加深区域内民众的情感交流，增强其联系的纽带，抗击外部的干扰，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甚至消除区域内各国由于历史、政治、外交等更种因素所导致的冲突与对抗。近年来，东北亚各国已经认识到文化因素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强制度建设以及塑造地区认同感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强区域文化身份的认同心理，无疑是促进东北亚区域深入合作的一条有效路径。为了推动东北亚合作的深化，尤其是要推动东北亚区域一体化，必须要加强对文化的理解，培育共同观念，特别是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因此，如何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向纵深发展，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

## 一、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对共同文化的确认，它反映的往往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即民族、国家、区域范围内成员对其文化的理解、接受和实践的文化心态。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它是一种可以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文化认同通过很多方面体现出来，如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建筑、服饰等浅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也可以通过行为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深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它体现着区域成员的共同利益，并在心理上、情感上形成对区域共同体的归宿感、依赖感，由此而焕发出牢固的内聚力。拥有共同的文化，往往是民族认

同、社会认同、区域认同的基础。

文化认同，作为一种理论，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的学者埃里克松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提出的。在此之后，文化认同理论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接受，诸多学者将其广泛运用于其它多种领域的研究。因此，这一理论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是，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文化”才开始进入国际关系研究的领域。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特别是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发表之后，引起了各国学者们对“文化”在国际政治中作用的广泛而深入的思考。从此，“文化认同”理论成为了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 二、东北亚地区的文化认同

东北亚文化认同是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认同。尤其对于作为东北亚地区核心的中、日、韩三国来说，儒家思想是自古以来联系三国的主要文化纽带，是其共同的文化渊源，共同的文化基础。中国、韩国与日本作为东北亚区域的主导力量，在历史上都曾以儒家理念为主流的文化价值取向，和谐、包容的理念成为各自文化中的正能量。可以说，儒家思想为东北亚区域奠定了相同的普世理想和价值基础。

东北亚文化在共性上来看，包含以下这样一些因素：“以人为本”的道德取向；注重国家与集体的价值取向；提倡“合和”精神，追求“天人合一”。“中庸”、“和谐”是儒家学者追求的最高价值，也是中国、日本与朝鲜、韩国文化精神的普遍原理之一。如今儒家传统仍是东北亚各国在顶层设计中所要考虑的核心要素之一，这就为构筑东北亚区域的文化认同心理奠定了历史基础。

## 三、文化认同在东北亚区域发展中的作用

### （一）文化认同为区域发展凝心聚力

文化认同是区域凝聚力的基础，是区域发展的精神动力，为区域的持续发展提供精神层面的保障。同源文化对作为文化载体的民族和国家有着强大的内聚力和向心力。共同的文化把人们凝聚在一起，并且始终对区域内不同的成员形成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凝聚力。文化认同还使区域内的成员间产生普遍的群体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区域成员之间的沟通、交流、合作等各方面比较容易进行。在共同文化的感召下，区域间各成员之间有比较强烈的愿望增强彼此之间的协调性、整合性，



从而保持整体的稳定，促进共同的发展。文化认同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有利于调动区域内各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为区域的发展服务。对于东北亚地区来讲，文化认同所起到的凝聚力的作用更是不可忽视的。文化认同代表着一种力量，代表着一种情感，因此，它是东北亚区域发展的黏合剂和推进剂。它有助于消除东北亚区域内的壁垒，加强各国间的交流与合作，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文化认同在东北亚的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为东北亚的发展凝聚了人心，汇聚了力量。

## （二）文化认同增强区域发展竞争力

区域文化竞争力是衡量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是影响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和深层力量。全球化时代是文化创新和文化竞争的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文化认同对于区域竞争力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和价值。文化认同是寻求某种文化的一致性或同一性，离开了群体成员对共同文化的确认，就难以形成区域发展的向心力和竞争力。文化认同促进了区域间各国的沟通、理解，因此可以大大降低各方面的成本。与此同时，文化认同心理意味着法制风险、经济风险与经营风险等的降低。这种风险成本的降低，会大大增强该区域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对于区域合作和发展来说，彼此之间文化的认同与信任心理是至关重要的。很多地区发展落后，一盘散沙，区域竞争力低下，这都与文化认同的缺乏或者缺失有极大的关系。而上文提到的在东北亚区域文化中普遍奉行的“以人为本”的道德取向；注重国家与集体的价值取向；提倡“合和”精神，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恰恰为这一区域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使得这一区域充满生机和活力，其区域发展的竞争力会不断地得到提升。

## （三）文化认同有利于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

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在区域一体化的浪潮中，文化认同所起到的作用尤其不可忽视，世界各国对此也越来越重视。文化认同的产生有助于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巩固和深入发展，而且有利于消除区域一体化发展中的障碍。文化认同对于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可以从欧盟的发展中得到突出的体现。可以说欧盟是区域共同体中一体化程度最高的，一方面得利于它本身的共同文化以及在交往中各国对文化方面的认同。东北亚地区虽然没有欧盟一体化的程度高，但在近年来，其一体化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认同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文化认同不但能加强地区各国的合作，促进经济联系，扩大各方面的交流，而且有助于打破国家之间的隔离感，消除矛盾和冲突，增进

互信和共识。可以说，文化认同不仅对东北亚各国经济的腾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成为带动东北亚地区合作的助推器，是东北亚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强大动力和重要保障。

## 提升文化软实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聂友军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号召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报告所传递的中国声音、所显示的中国力量、所凝聚的中国精神、所提供的中国方案，以及胸怀世界、兼济天下的恢弘气度，必将在国内国际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提升文化软实力是社会文明进步和人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提高民族凝聚力与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使命担当，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积极尝试，是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充分体现。提升文化软实力是内外兼修的长期功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引领未来的高远目标，提升文化软实力可以更加有效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

提升文化软实力，有利于推进现代化建设。文化软实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是综合国力最核心的部分，文化现代化也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化以其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整合凝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其他方面发挥引领作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则是创新的必由之路。

提升文化软实力，有利于完成祖国统一。两岸人民对共同拥有的中华文化的认同与热爱，彰显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凝聚力。爱国团结统一内蕴于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中，浸润到两岸同胞的骨髓血脉里。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两岸同胞的民族自豪感、身份认同感与价值归属感，打造联系两岸最牢固的纽带。在一个中国与“九二共识”基础上，以共同坚守的中华文化为基盘，以协商化解分歧，以合作取代对抗，“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

提升文化软实力，须固本培元，坚持不忘本来。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以德润身，以文化人。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本质上是核心价值观的较量，最终要靠国民素质来支撑，因此要从思想道德抓起，从社会风气抓起，从每一个人抓起。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一再证明：“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提升文化软实力也要立足于传统文化这个源头活水，遵循鲁迅先生提倡的“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的拿来主义，批判继承和借鉴中国文化遗产及外来文化，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优势。

提升文化软实力，须兼收并蓄，善于吸收外来。异质文化之间有同有异，共性使跨文化对话成为可能，差异性使相互取长补短成为必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形成、汉语的演变及中国文化的丰富发展都与外来文化攸切相关。佛教传入中国，始开中外文化大规模交流的先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出现，西方文化起到触媒作用；当代文学艺术的繁荣也离不开20世纪西方各色理论的滋养。我们要坚持以我为主，既善于向世界各国优秀文化学习，大胆吸收和借鉴有益成分，又坚决避免盲从，旗帜鲜明地反对生吞活剥、削足适履、自我矮化的做法。近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借重“求知识于世界”的开放政策，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由于缺乏客观审视自我的余裕，仓促学来的外来文化没有很好地消化吸收，加之受狂妄的民族主义裹挟，走上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道路，最终黯然吞下战败并被外国驻军的苦果，其惨痛教训从反面予我们以警醒。

提升文化软实力，须持续创新，勇于面向未来。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倡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里的科学，指的是“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按照习近平同志“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的要求，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炼传统文化资源中“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髓”，并着力予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与时代特征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与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行为相联系，自觉赋予传统文化以时代精神，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转换。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发展，先后结晶和升华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的典范，对提升文化软实力具有较强的示范价值。

从战略上思考和谋划提升文化软实力，作内外兼修的长远规划，在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的同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安全和未来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登高望远，进行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擘画。在党引领全国人民取得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之时，在中国发生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之际，在我们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之机，在我国日益

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我们党在办好中国事情，发展好中国的同时，积极主动为世界大家庭的携手并进谋篇布局、筹划未来。党的十九大刚刚胜利闭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被载入第72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决议，表明该理念高度契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普遍期待，给充满不确定的世界指明了方向。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升国家形象亲和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为经济建设赢得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以昂扬的姿态向世界展示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强调合而不同，求同存异，鼓励和加强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文明对话。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必将为尚在摸索独立发展路径的国家和民族提供有益参照。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出新的重大贡献。随着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强，我国将更多更深入地参与各领域的外交活动。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争取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今天，我们踏上新征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针，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工作力度，以逆水行舟、溯洄从之的必胜决心，全面提升文化软实力，让中华文化绽放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健步迈向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新时代。

# 十九大报告与中国新型国际关系理论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尹 虎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合作共赢成为日益突出的全球性挑战，实现和平与发展则成为时代的诉求。在此背景下，十九大报告明确了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阐释了国际发展背景和趋势，总结了我国对外交工作的使命、责任、和推进方略，为我国对外政策的今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十九大报告的一个重要外交思想贡献就是重新定义了新型国际关系，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作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的同时，还增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承担大国责任等内容因素，为中国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道路。

## 一、新型国际关系理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其实，自冷战结束之初的 20 世纪 90 年代起，中国就极力倡导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国家关系，与世界各国建立起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此种，坚持对话，不搞对抗的外交方针，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外部环境，并有力推动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拓宽了中国外交的格局。这一过程中，中国倡导建设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也渐渐发展成为内涵丰富，逻辑连贯的有机整体。

总体上，新型国际关系理论是国家之间为寻求共同利益而建立的一种合作关系，是一种平等而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寻求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保持并推进双方关系发展的良好状态。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敌我关系已经非常模糊，演变为非敌非友的伙伴关系。在处理新型国际关系时，国与国之间必须学会相互尊重，以公平、正义的途径，形成合作共赢的局面，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 二、相互尊重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前提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制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革开放以后，则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安邻、睦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方针。实践过程中，中国政府一贯坚持了大国之间相处时，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与小国相处时，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的立场，渐渐形成了“亲、诚、惠、容”为主要表现的外交理念。这种立场和理念赢得了世界各国的认可及高度评价。毋庸置疑，相互尊重，同舟共济，世界的和平、繁荣才可以保障，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才能有基础。

此外，十九大报告还主张，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并强调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换言之，中国外交中的相互尊重的立场，不仅体现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呈现于不同的文化和文明间。

### **三、公平、正义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

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各国应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总体上，十九大报告体现出了正确义利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观，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观，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当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原因是一些西方国家保持西方优越论和欧洲中心论，置国际公平和正义于不顾。正是由于霸权、强权思想的作祟，某些国家在外交、经济、军事等领域采取害人利己，只顾当前，不顾未来的政策，严重影响着弱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

冷战后，中国坚决反对脱离公平、正义原则的政治活动，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例如，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框架下，中国努力实现与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此外，中国致力于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力度，促进缩

小南北发展差距，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正在用实实在在的努力，积极维护世界公平与正义，推动新型国际关系落到实处。

#### **四、合作共赢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有效保障**

合作共赢，强调共同发展，利益共享，中国政策一贯强调，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并致力于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新型国际关系追求以合作、对话、协商等渠道来实现各自利益。其特点是参与各方寻求双方互利（双赢）的过程中，不以牺牲第三者（个体，整体，环境）利益为前提。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世界各国利益日益融合，尽管国家间政治、法律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文化信仰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共赢却是最大公约数，以对立、施压和对抗解决全球性挑战没有出路。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就是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生态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按照这一要求，中国积极倡导国家间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 **五、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型国际关系的目标**

习近平同志多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提出各国人民要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型国际关系建设的思想基础，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核心要义。

十九大报告就人类面临的许多共同挑战时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而且，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可以说，十九大报明确表明中国不仅会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也会成为推动共同治理的平台和桥梁，并清楚的回答了“在国际社会中，中国要面对什么，该怎样面对”的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十九大精神代表着新时期中国对国际形势的清醒认识，它将会引导国际社会达到开放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境界。



具体而言，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主要基于两个合作框架：一是合作发展，建立开放与合作的大市场，建设互联互通大网络，让国际社会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增大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二是合作安全，建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对话、协商机制，打造基于共同安全的新型安全合作机制，以合作的精神处理争端，降低发生冲突的风险。

## 六、中国积极承担大国责任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推动力

中国奉行“得道多助”的原则，在积极为东亚各国发展提供广阔市场的同时，积极与世界各国开展经济合作，共同促进安全框架的建设，在国际秩序建设上的导航作用日趋显现。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众多周边邻国的大国，需要有能够起大国主导性的能力。构建周边地缘区域性合作机制，是中国与邻国关系的一个新发展。迄今，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了对话与合作机制。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既包括自贸区，也包括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的政治与安全对话合作；上合组织是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共建的区域合作机制，以安全合作为中心，也拓展到经贸、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重要的是，上合组织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在提升，成为构建区域新安全关系和新秩序的重要平台。

近年来，中国还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大国责任与担当”的积极响应，并作为东道国分别在2014年11月、2017年7月、2017年9月成功举办了APEC峰会、G20峰会、金砖峰会这样的大型多边合作会议。

中国应抓住历史机遇，通过积极承担大国责任来深化国际社会对共同利益和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为地区秩序的塑造提供可预期的收益。在多边合作的框架下提供公共物品，是缓解地区国家对华疑虑的最有效途径。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愿望。只有坚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才能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宗旨，从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最终把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人类梦想变为现实。

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展现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瞬息万变、挑战不断的国际环境中坚定不移、运筹帷幄、信心十足地打造中国的大国角色和外交实力的智慧与决心。它代表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方向，也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景。而且，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符合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发展趋势，具有很大的必要性和很高的可行性。

当然，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是一个长历史进程，需要国际社会的理解、认可与支持。在如今复杂多变的世界，要实现这种“和谐”与“大同”并非易事，既需要时间的考验，也需要进程的检验。可以说，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将成为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

## 人间佛教在东亚与东南亚的传布 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举办

2018年1月6日-7日，以“人间佛教在东亚与东南亚的传布”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顺利召开。研讨会由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佛学研究文学硕士课程、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东亚佛教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国际禅文化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哲学院佛教研究团队协办。

来自国内外40多名专家学者、法师参加了会议，通过分享自己的论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讨了现代人间佛教的发展。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剑锳教授主持了开幕式，会议分为三个会场、共先后六场。



其中，高文强（中国武汉大学）的“论星云大师的自然审美观”；张雪松（中国人民大学）的“当代中国大陆地区汉传佛教公选公派留学生问题研究”；谭洁（中国山东师范大学）的“星云与马云现代经济观之比较”；郭磊（韩国东国大学）的“韩国近

现代佛教的发展与星云大师人间佛教对其之影响”；刘宇光（中国复旦大学）“‘左翼佛教’译词再议：在现代佛教、社会主义及左翼之间”；邓子美（中国江南大学）的“启明星冉冉升起——论人间佛教在东南亚传播三阶段”；史芬妮教授 Prof. Stefania Travagnin（University of Groningen）的“Turning Prayers into Action: History and Achievements of Buddhist women practicing renjian fojiao in 20th and 21st century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等发表尤其受到广泛关注及高度好评。

本次会议为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学者提供了交流的机会，不仅促进了学术发展，也加强了学者间的友谊。在陈剑隍教授的主持下，各位嘉宾总结了本次会议的收获和感想，同时设想了有关人间佛教未来发展的学术路径，会议圆满结束。

（信息来源：禅风网）

## 数字人文与东亚文献共享国际学术会议在广州召开

2018年1月10日，数字人文与东亚文献共享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山大学开幕。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大学东亚图书馆，港澳台地区与国内公共、大学图书馆馆长，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学者以及数字人文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近80人出席会议。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与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开幕式由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主任王蕾主持。

在主旨报告环节，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刘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周欣平、台湾大学数位人文研究中心主任项洁，我校历史系教授、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志伟分别围绕当前数字人文研究的中国困境与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人文与大学图书馆未来的发展、典籍的数字化与数字人文，以及数字化时代对历史学的挑战等主题发表了主旨演讲。

在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专家学者将分别就元数据与数字人文工具，数字人文与史学研究，数字人文与图书馆特藏资源建设，数字人文的基础设施、平台建设、课程教育等主题报告相关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专家学者们在会议专题论坛部分还将围绕东亚文献的共建共享、数字人文基础设施与技术合作发展等两个主题开展讨论。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于推进数字人文研究领域的创新与合作、加强东亚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有着重要意义。会议期间还设立了“中山大学图书馆藏西文珍本展”“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徽州民间历史文献展”两个特藏展览。

（信息来源：中山大学图书馆）

## “文献与东亚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在宁波顺利召开

2018年1月18日,由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韩国庆北大学国语国文学科BK21+事业团共同主办的“文献与东亚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在宁波大学成功召开。来自中韩双方的24名老师、博硕士研究生参加了研讨会,围绕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从扎实的文献的出发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讨论。人文与传媒学院张伟院长、严建雯书记、韩国庆北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郑羽洛院长出席了本次研讨会。研讨会共分三个部分:开幕式、发言单元、研讨总结。

开幕式由人文与传媒学院薛显超博士主持,张伟院长首先致欢迎词,欢迎韩方来访并对人文学院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韩方郑羽洛院长致辞表示感谢,介绍庆北大学国语国文学科的基本情况,强调两院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表达了希望进一步合作的意向与诚意。



研讨会发言单元,张如安教授以《略论王治本的日本游记散文》为题做主题发言,介绍了王治本董颖游记的特色及其中日交流中的重要意义;郑羽洛教授则以张锡英的《辽左纪行》的文本,对其行进路线、体验及意义等方面做了阐发。郑洁西副教授对万历朝鲜战争期间的四大援朝经略著述进行了相关考述,强调一手资料的重要性,认为中国救命经略的相关记载可以完善、还原战争的真实面貌;王晓辉博士则从语言习得的角度,分析了中韩语言的差异,对汉语程度词的学习方法做了重点的分析。此外,

中韩两方的 8 位博硕士同学也分别进行了主题发言。

在研讨环节，与会师生围绕着发言及研讨会相关主题进行讨论、交流。现场严肃活泼，其乐融融。在研讨会最后，薛显超博士总结认为，此次研讨会发言质量高，讨论卓有成效，不仅加深了友谊，开阔了视野，而且为未来更加深入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信息来源：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 《东亚经纬》征稿启事

《东亚经纬》是由浙江工商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东亚研究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机构主办，面向全国相关机构内部发行的学术季刊。

本刊以研究“东亚学”理论，探讨东亚地区热点问题，分析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走势，传递海内外“东亚学”研究动态及信息为己任，开设“观察与思考”、“名家访谈”、“学术动态”等栏目。

《东亚经纬》不仅是从事东亚研究的各界人士开展学术探讨和交流的平台，也是相关部门了解和认知“东亚学”领域重要研究成果的渠道之一。

为进一步提高《东亚经纬》信息质量和可读性，能够全面反映“东亚学”研究的现状，兹长期征集相关东亚的研究稿件。征稿要求如下：

- （1）稿件要求立意新颖，观点鲜明，内容充实，论证严密，语言精炼，资料详实；
- （2）稿件必须由作者（或合作者）完成，杜绝抄袭。字数以 2000—3000 字为宜，优秀稿件可适当放宽字数要求；
- （3）稿件中如有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际标准，尽量不用图表；
- （4）一般不使用注释，如有引文，可在引文后加括号，注明出处（按作者、文献名、期刊或出版社、年月顺序）；
- （5）附上作者简介，信息包括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联系方式等。

本刊收到稿件起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阅，并通知作者稿件处理情况。稿件一经采纳，本刊将略付薄酬。

投稿邮箱：youno2014hz@mail.zjgsu.edu.cn

邮寄地址：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正街 18 号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邮编：310018）

《东亚经纬》编辑部